

東亞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朝鮮譯官角色

——以譯官金指南的活動為中心

羅 樂 然*

■ 摘 要 ■

近年，明(1368~1644年) 清(1644~1911年) 中國與朝鮮王朝(1392~1910年) 的交涉關係史研究方興未艾，隨著大量且資料豐富的『燕行錄』出版後，使得東亞不同地區的學者，紛紛採用有關資料，把中國與朝鮮之關係，以更嶄新的史料及角度，補充以往學術界的不足。除了擔任領導的燕行使臣外，一些於使團服務的人，例如擔任翻譯與禮節安排的譯官，其角色對兩地之間的交涉亦不可忽略。

以康熙年間活動的譯官金指南(1654~1718年) 為例，他曾於清廷穆克登(1664~1735年) 考查中朝兩地邊境之勘界團接待使團之中擔任譯官，負責與中國官員周旋兩地邊界的定案。又在燕行期間把一些韓國少有的書籍帶回朝鮮，並將之翻譯，方便國內士人或官員閱讀。除了協助各種對外使團及委派任務擔任譯官，方便朝鮮與東亞之間的文化交流，他在任職朝鮮負責翻譯工作的司譯院院正期間，開始負責紀錄譯官職掌及中朝兩地交流的重要書籍『通文館志』的編撰。由此可見金指南在各方面的對外工作之中，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故此，本文嘗試利用朝鮮及中國兩地出版及未出版的資料，如『通文館志』、『譯官上言謄錄』、『北征錄』、『新傳煮砂方』、『東槎日錄』等，並以翻譯研究與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相關概念試圖探析18世紀朝鮮後期間，金指南等譯官在擔任朝鮮對外關係時所扮演的角色及帶來的影響，其影響不在於語文上的翻譯，亦是一個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媒介。

【關鍵詞】 金指南 朝鮮譯官 燕行使 清-朝鮮關係

目 次

- | | |
|------------------------|-------------------------|
| I. 引 言 | IV. 翻譯規範與東亞文化交流史視野下的金指南 |
| II. 金指南所身處的康熙年間的朝鮮對外關係 | V. 結 論 |
| III. 金指南的生平與事功 | |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 login.law@gmail.com

作者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一級研究助理。本文初稿曾於2014年12月18-19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辦的‘書寫中國翻譯史’第六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在此，感謝會議期間負責拙文評論的老師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東洋學』安排的匿名審查專家，均給予不少珍貴意見，使論文更為完備。當然，文責自負。

I. 引 言

漢字文化圈各國之間的交流過程，因各國皆是漢字發展成熟的國家，筆談以及書信往來已成為了各地之間交流媒介，一直都被太多學者關注到東亞文化交流之間的語言及翻譯問題。然而，以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的交往為例，自高麗王朝(918~1392年)於13世紀，受制於元朝的威脅，並被迫成為元朝屬下的‘征東行省’¹⁾在這種外交必要下，高麗便於1276年成立通文館，專責訓練外語人材，處理有關事務。²⁾可見，漢字的交往有其不足，故高麗方面才有其必要訓練譯官來處理與中國交往的事務。這種譯官培訓制度，朝鮮王朝將之繼承，並沿用了高麗晚期改名的‘司譯院’，繼續培訓漢語等外語官員。³⁾而朝鮮王朝成立初期時，朝廷已明確表明，訓練這些譯官，最重要之目的是‘以小事大，古今之通義也，況我朝，僻處海陬，語音殊異，因譯以達，故司譯之任，誠為重矣。⁴⁾因此，所謂事大以誠，實際上透過譯官完成各種任務及論述之表達，向明清中國示好。⁵⁾故透過對朝鮮譯官的了解，不但可認知朝鮮與中國的文化交流過程的關鍵轉變，並且從個案探討翻譯及語言等文化元素如何影響東亞文化交流的過程。⁶⁾

朝鮮王朝(1392~1910年)與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兩朝的關係研究，一直有不少學者所觸及，⁷⁾特別是近年學者們採用各種朝鮮使節使行北京時所撰寫的『燕行錄』，⁸⁾探討不同面向的朝鮮與中國

- 1) 征東行省是高麗被元朝(1271~1368年)多次入侵後，議和後的結果。表面上，元朝將高麗併於版圖之內，與其他行中書省一樣。但實際上，高麗國王便是行省丞相，更掌管一切行省內行政及任命權，擁有高度的獨立自主。而元朝滅南宋(1127~1279年)，並統一中國後，有意征日，便以朝鮮半島作為跳板，故將朝鮮半島行省直接命名為「征東行省」。「征東行省」並不是在高麗持續成立，是當元朝有意向日本征伐時，就會在朝鮮半島成立「征東行省」，以便搜集軍需資源。關於此，參丁崑趾，「元代征東行省之研究」，《史學彙刊》，第10期(1980年6月)，頁157-190。
- 2) 鄭麟趾，『高麗史』，서울: 亞細亞文化社，1972，卷76「志30·百官1」，頁678-679。
- 3) 朝鮮太祖特別重視翻譯，故按高麗制度，沿設置司譯院。關於此，詳參林東錫，『朝鮮譯學考』(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頁86-89。
- 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서울: 國史編纂委員會，1986，『太宗實錄』卷8，太宗4年8月20日己丑，頁4b。朝鮮首任司譯院長官僕長壽亦解釋了司譯院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世事中國。他指出：「臣等竊聞，治國以人才為本，而人才以教養為先，故學校之設，乃為政之要也，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不可不習，是以殿下肇國之初，特設本院，置祿官及教官、教徒生徒，俾習中國言語訓文字體式，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效……」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6，太祖3年11月乙卯，頁17a。
- 5) 關於事大以誠的內容，詳參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2009)，頁167-201。值得一提的是，事大以誠的觀念在清代有另外的論述，最明顯的是他們對於清朝的態度與明朝的態度實為天淵之別，對於原來的事大觀念已有所不同。有部份學者認為此為華夷觀之改變，關於華夷觀轉變之討論，詳參禹景燮，「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한국사연구》，第159期(2012年12月)，頁237-263；禹景燮，「宋時烈的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震檀學報》，第101期(2006年6月)，頁257-289。
- 6) 關於此，詳參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87-218。
- 7) 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的學者都以他們熟悉的語言發表了不少論文，以中國為例，首推陳捷先、陳尚勝、孫衛國等，臺灣則可參見劉家駒、李光濤、張存武等學者之著作，而韓國方面則以全海宗及崔韶子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日本方面，則比較值得關注的是中村榮孝及山口正之的研究。以上學者的研究不再一一羅列，可參考崔韶子，「明清時代對外關係史의 成果과課題」，《明清史研究》，第19期(2003年月份缺)，頁33-61。
- 8) 關於『燕行錄』訂名之問題及相關的討論，詳參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 - 燕行·通信使行에 관한 韓中日 三國의 國際워크숍 -』，頁47-49；徐仁範，「조선전기 연행록 사료의 가치와 그 활용」，《명칭사연구》，第30輯(2008年10月)，頁13-48；崔韶子，「『燕行錄』 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칭사연구》，第30輯(2008年10月)，頁1-11。

關係的研究,⁹⁾ 呈現以往史料未所涉及的畫面, 包括燕行使視野下北京社會面貌,¹⁰⁾ 傳教士活動,¹¹⁾ 儒家文化發展等等,¹²⁾ 當中尤以17世紀以降, 清朝成為中華帝國的管治者, 朝鮮朝廷與士大夫對於清廷及其文化特別蔑視, 但礙於實際需要, 朝貢活動仍需持續。故在這種理想與現實考慮之間的張力比較之下, 作為兩地文化交流之間媒介的朝鮮譯官, 在清代有其特別的研究價值。

這些專責朝貢事務的譯官, 在士大夫與朝廷不願多接觸中國事務的情感影響下, 顯得特別重要。而且, 他們是兩地之間交流過程中, 最直接的參與者, 從他們的經歷, 可以更完整地觀察兩地關係的各種議題。因此, 本論文就譯官的事務為切入, 從中觀察他們如何影響著清與朝鮮之間的關係。

雖則譯官在中朝關係及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但是譯官研究一直只保留在韓國國別史研究的課題之中, 過往亦只有為數不多的相關文章及書籍於韓國出版, 而且這些研究成果均是以譯官制度,¹³⁾ 中人身份及地位有關的制度史及社會史為研究方向,¹⁴⁾ 又或是以不同譯官家族的研究個案出發, 來觀察當時的政治及社會。¹⁵⁾ 而且, 不少譯官一直都涉及到對外往來的經歷, 特別是前往北京的燕行使, 譯官的工作不能忽視, 是中韓交流甚或東亞文化交流圈之中的重要媒介。¹⁶⁾ 然而, 學術界就此更探入探討的研究雖有一定的成果,¹⁷⁾ 但更多宏觀地討論他們參與的外交活動, 或是不同的文化交流史研究之中說明到譯官在

9) 裴英姬, 『『燕行錄』의 研究史回顧(1933~2008年)』, 『臺大歷史學報』, 第43期(2009年6月), 頁219-255。

10) 范金民、羅曉翔, 「朝鮮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國風情——以崔斗燦『乘槎錄』為中心」, 『史學集刊』, 2009年第3期(2009年5月), 頁56-64; 楊雨蕾, 「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 『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4年第4期(2004年9月), 頁55-63; 王振忠, 「朝鮮柳得恭筆下清乾嘉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抄本『冷齋詩集』為中心」, 『中華文史論叢』90(2008年6月), 頁133-177; 並參楊雨蕾, 『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1), 頁46-47; 원재연, 「17~19세기 연행사의 북경 내 활동공간 연구」, 『동북아역사논총』26(2009年12月), 頁205-262。

11) 關於此, 詳參羅樂然, 「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 『中國史研究』82(2012年12月), 頁93-114; 楊雨蕾, 「朝鮮燕行使臣與西方傳教士交往考述」, 『世界歷史』, 2006年第5期(2006年10月), 頁126-131; 鄭恩主, 「燕行使節의 西洋書 인식과 寫真術 유입: 北京 天主堂을 중심으로」, 『명청사연구』30(2008年10月), 頁157-199; 장경남, 「조선후기 연행록의 天主堂 견문기와 西學 인식」, 『우리文學研究』26(2009年2月), 頁77-177。

12) 儒家思想之中, 朝鮮燕行使特別對實學有更深入之探究。關於此, 詳參楊雨蕾, 『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 頁224-230。

13) 韓國方面例如分析早期譯官的身份、制度及考試方法的白玉敬: 『朝鮮前期譯官研究』(서울: 韓國研究院, 2000)、簡述朝鮮時代譯學史的姜信沆, 『李朝時代의 譯學政策과 譯學者』(서울: 塔出版社, 1978)、關於譯官的試卷研究可參考鄭光, 『朝鮮朝譯科試卷研究』(서울: 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 1975); 還另尚有探析譯官在朝鮮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史貢獻及影響者如李哲成, 『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서울: 國學資料院, 2000), 頁44-60。中國方面例如北京大學張敏, 「韓國譯學源流考」, 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 『韓國研究論叢』22(上海: 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 2009), 頁319-334; 另外,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烏雲高娃博士論文以『明四夷館及朝鮮司譯院研究——以『蒙古語學』為研究中心』為題, 探析中朝兩地的翻譯機構及其歷史, 其後並發表若干論文討論朝鮮司譯院的研究, 特別是蒙學方面的教習活動。詳參烏雲高娃, 「朝鮮司譯院蒙古語教習活動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 總137期(2001年7月), 頁122-123。

14) 例如韓國研究朝鮮時代譯官的專家金良洙, 他的博士論文就是探析譯官在朝鮮後期的身分研究。詳參金良洙, 『朝鮮後期の 譯官身分에 관한研究』(서울: 延世大學校歷史學科博士論文, 1986)。

15) 金良洙, 『조선후기 中人집안의 말진: 金指南、金慶門 牛 牛峰金氏事例』, 서울: 白山資料院, 2008。

16) 最早把翻譯官員視為文化交流及外交媒介的研究可見於楊聯陞, 「中國文化的媒介人物——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〇次座談會紀要」, 『大陸雜誌』, 第15卷第4期(1957年8月), 頁32-33。

17) 關於譯官作為文化交流、對外活動時作出的貢獻與角色的研究例子, 可參考劉婧, 「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 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 『동아인문학』12(2007年12月), 頁255-276; 이상규, 「조선후기 川寧玄氏家の 譯官活動」, 『한일관계사연구』20(2004年4月), 頁197-239; 金良洙, 「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的 政治外交: 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 『역사와 실학』12(1991年1月), 頁311-366; 장안영, 「18세기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역관 통역의 문제점 고찰: 『노가재연행일기』·『을병연행록』·『연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 『어문론집』62(2015年6月), 頁349-372, 亦可參考不過, 這些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們個人活動的描述, 而忽略了譯官的活動如何形成擔當朝鮮與外界之間的媒介, 以及朝鮮社會如何塑

介入兩地士人的交流，而卻沒有聚焦他們在文化交流過程之中的媒介角色以及他們的角色是如何反映著朝鮮朝廷的一些社會期盼，這些觀點均是學界所忽略的，似乎可利用不同的概念重新觀察朝鮮譯官的媒介角色。

眾多的譯官之中，出身於朝鮮仍蔑視清廷的康熙(1661~1722年)年間的金指南(1654~1718年)似乎有助我們去了解朝鮮譯官在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之中的角色。¹⁸⁾ 他曾參與多次燕行活動，並籌劃編印有關中國有關對外事務的書籍『通文館志』，並在穆克登(1664~1735年)勘界團之中，發揮了媒介作用，亦為朝鮮朝廷在有關勘界過程佔得優勢，並決定了往後有利於朝鮮一方的中朝邊界安排。相對較少關注的華文學界，¹⁹⁾ 金指南在韓國學界已獲得一定認知，²⁰⁾ 其中對於他參與穆克登勘界團的角色，이상태已著墨不少，特別提及到金指南如何使穆克登的想法有所改變，而得出了讓朝鮮滿意的邊界結果。²¹⁾ 與此同時，他於1688年處理漂流到濟州島的潮州漂流民的事情，²²⁾ 以及參與1711通信使的考察過程，²³⁾ 都獲得了充份的研究。故此，本文並非單純與過去的研究，重塑金指南的生平，以及探討他的責任與貢獻，而是希望以金指南參與各種朝鮮對外關係的活動過程之中，試圖以翻譯規範的概念以及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構想，了解朝鮮朝廷在康熙年間，如何期盼譯官擔當不同的角色。翻譯規範的觀念為翻譯研究現時經常採用討論的研究觀點，簡單來說是指當地的譯官或翻譯材料，或會受到各種的社會與文化規範，包括國家機構、贊助人以及政策等的氛圍，而影響了翻譯的態度與操作。雖然本文主要集中討論的是譯官的工作與活動，而非翻譯的文本，但是因譯官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擔任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故翻譯規範亦可應用於本文之中，試圖了解譯官擔當的角色如何受到社會上對譯官的期盼而作出相關的活動對應。²⁴⁾ 此外，本文亦希望從黃俊傑提

造他們成為媒介角色的社會與文化因素。不過，另一篇值得參考的留意到譯官在情報與知識收集的角色，是相當值得參考的研究成果，但他卻忽略了譯官除了情報收集以外的媒介功能。關於此，詳參진재교, 「18세기 동아시아와 지식·정보의 메신저, 譯官」, 『韓國漢文學研究』 47(2011年月份缺), 頁105-137。

- 18) 17世紀以降，滿洲人於中國東北建立新政權，並對明朝與朝鮮帶來威脅，及後滿洲人更先後多次入侵朝鮮，並南下滅明，成立中華帝國新主人。朝鮮對於明清易代表現得十分反感，但是礙於實際政治考慮，被迫接受與清廷的朝貢關係而事實上，有關情感一直延續到康熙年間並未有明顯的改善。關於此，詳參徐東日, 『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63-149。
- 19) 筆者曾撰有同領域但不同面向的拙作，分別是羅樂然, 「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 『漢學研究』 第33卷第3期, 頁345-378；羅樂然, 「作為東亞文化交流媒介的朝鮮譯官——以朝鮮中葉的金指南家族為研究個案」, 載於周佳榮、范永聰編, 『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223-266。這些研究成果之中然有一定篇幅談及金指南的活動以及貢獻，但面向卻不同，發表於『漢學研究』的論文主要關心的是金指南的功績如何驅使到金慶門亦從事譯官工作，而且最終的探討目的是在於金慶門在燕行使團的工作，而後者則以宏觀的形式、向香港學界介紹有關譯官家族金指南在朝鮮的情況，重點在於說明朝鮮譯官的工作特性。然而，本文卻著重於金指南的譯官活動，如何在東亞的環境之中，代表著朝鮮社會的文化與期盼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成為了朝鮮與清廷或是東亞的文化媒介。
- 20) 김양수(金良洙) 曾以他為例，探討牛峰金氏的家族及擔任譯官的成員情況，詳參김양수, 「조선 후기 우봉김씨의 성립과 발전——계동공파의 김지남등 중인을 중심으로」, 『실학사상연구』 33(2007), 頁5-78。
- 21) 이상태, 「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 『역사와 실학』 第33期(2007年9月), 頁75-119。
- 22) 박현규, 「1688년 조선 濟州島에 표착한 潮州 출항선 기록 검토」, 『동북아문화연구』 第14期(2008年3月), 頁29-46。
- 23) 백옥경, 「역관 김지남의 일본 체험과 일본 인식: “동사일록”을 중심으로」, 『한국문화연구』 第10期(2006年10月), 頁169-198；另參李成厚, 「金指南의 동사일록연구」, 『金烏工科大学校論文集』 第3期(1982年月份缺), 頁97-114。兩篇文章都對於金指南的『東槎日錄』作出詳盡分析以及金指南對日本的想法，而其中白玉敬的研究更發現金指南的日本觀是與其對於朝鮮繼承中國文化而認為日本的文化不及朝鮮的，但他們對於金指南的研究，在於他的個人經歷及對日本的想像，而卻非處理譯官在對外互動工作與活動期間，反映譯官群的媒介角色。
- 24) 關於翻譯規範的理論構想，可參考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1997)；Gideon Toury, *The Nature and Norm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出所聚焦於交流過程的觀念，重構在東亞文化交流體系下的文化活動過程，金指南如何穿梭在各國之間，擔當朝鮮期盼他所扮演的政治、語言以及文化媒介的角色，不但可重新了解朝鮮社會與譯官之間的關係以及譯官在交流史之中的角色，為學界可更全面地了解朝鮮譯官研究的學術價值。

II. 金指南所身處的康熙年間的朝鮮對外關係

在了解金指南的身份以前，有必要這個時代背景，這種時代背景的掌握，有助了解當時朝鮮對外之間的關係如何建構期盼朝鮮譯官工作的翻譯規範，亦即朝鮮譯官處於一個甚麼樣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進行交流活動，而最後得出相關的行動。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年，1644~1661年在位)入主北京，確認滿清正式繼承中華帝國的管治權後，²⁵⁾ 朝鮮繼續與清廷進行朝貢活動，並將會出使地點，從瀋陽改為北京，繼續進行有關活動。²⁶⁾ 清初的朝鮮士人對於燕行以及參與中國事務，呈現兩種思考上的面向。其一，朝鮮情感上不太願意與滿人交涉，不少士人不願意參與有關活動。另一方面，朝鮮希望利用朝貢的機會，掌握更多清廷的情報，了解這個外族政治以及社會現象，對於朝鮮王朝審視當時的局勢有關鍵的作用。²⁷⁾

由於實際的需要，他們仍需於當時維持朝貢關係，並每年派出若干數量的燕行使團出發到北京。然而，對於他們前往北京，除了是帶著一種被迫的情感前往以外，還是希望觀察中國士人如何理解明清易代的變化。²⁸⁾

另一方面，朝鮮自社會因壬辰倭亂、²⁹⁾ 丙丁胡亂等戰亂嚴重破壞後，³⁰⁾ 不少地區，特別是北方根本無法耕作或從事經濟活動。長白山以南的朝鮮半島土地並不十分適宜進行農業活動，故不少朝鮮人便籍滿洲人入主北京後，國防空洞的機會，移住到中國地區生活底從事伐木、採參等經濟活動。然而，問題日益嚴重，清廷亦覺得有必要作出整理，故特別向朝鮮一方經常爭論有關事宜。

從『同文彙考』的紀錄，³¹⁾ 於康熙年間，有十多次的紀錄，³²⁾ 記載朝鮮人因各種原因，包括採集人蔘、伐

25) 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9-29.

26)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37。

27) 關於此，詳參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總81期)(2006年6月)，頁29-58。

28) 谷小溪，『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6期(2013年11月)，頁96-97。

29) 豐臣秀吉(1537~1598年)於戰國時代統一全日本後，便希望利用此機遇進攻朝鮮半島，以達到最終挑戰大明帝國的政權以及解決國內的不穩問題。於是，日本便先後發動兩次的朝鮮戰爭，史稱為壬辰倭亂。最終明朝為保護朝鮮派兵助戰，成為了一場東北亞三國之間的一場國際性戰爭。關於此，詳參崔官，『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0) 所謂丙丁之役，是指兩場後金(1616~1636年)政權向朝鮮發動的戰爭，即丁卯之役(1627~1628年)及丙子之役(1636~1637年)。丁卯之役，朝鮮不敵後金，在位不久的仁祖(李祹，1595~1649年，1623~1649年在位)被迫逃難漢陽，在江華島避難，後來後金擔心明朝反擊，故立刻簽訂了『江華島條約』，朝鮮被迫成為兄弟之國，停止奉明朝年號。丁卯之役後，朝鮮只與後金成為兄弟，並未改變了明朝與朝鮮的關係。於是，在政治及軍事的需要上，後金認為需要向朝鮮發動多一場戰役去確保朝鮮「事清」，而放棄「事明」。有關此，詳參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1-48，頁99-148。並參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頁2-21。

木、狩獵、偷竊等原因，越江前往東北地區時，被清廷官員捉拿，然後禮部知會，而朝廷每次都需要對清國為這些問題作出解決辦法，³³⁾ 而及後更引發了清廷有意釐清中朝邊界，希望藉此避免犯越問題再發生。

當中，又以李萬枝事件的越境為重要的導火線，亦引發了穆克登到當地處理有關事宜，並籍此到朝鮮邊界進行勘界。1711年，李萬枝(生卒不詳)等人越江前往採蔘期間，被人發現，於是便將十多個清人殺掉，後被朝廷捉拿，並要求朝鮮派人前往會審。³⁴⁾ 結果，刑曹參議宋正明(1670~1718年)便前往鳳凰城參與有關會審，以及譯官金指南兒子金慶門(1673~1737年)處理有關事務，維護朝鮮人的權益。³⁵⁾ 而同時間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亦籍此機會到當地查案的同時，利用此機會前往朝鮮邊界進行勘界。

另一方面，在壬辰倭禍以後，朝鮮王朝(1392~1910年)曾實行鎖國政策，嚴禁與日本進行交流。³⁶⁾ 隨著日本政權的改變，³⁷⁾ 朝鮮王朝有關的禁令亦慢慢解除。於是，朝鮮王朝因應各種的原因，先後向日本江戶德川政府，派送了12次通信使團，³⁸⁾ 一般文獻之中他們均稱對日之間的活動為交隣。無論是純粹的政治或是經濟的考慮，他們都按特定的路線與安排，前往日本，完成各種使行禮節及目的。由於行政與使行的需要，很多時候都需要譯官擔當溝通以及收集情報的工作。³⁹⁾ 因此，譯官的培訓成為了朝鮮朝廷處理對事務的重要事項。

從以上背景的基本說明，可以了解到朝鮮譯官當時所經歷的國際環境以及他們往往需要處理參與各種對外的事務，維護國家的權益。而事實上，金指南正正出身於這個時代，為朝鮮一方，一方面維持朝貢體系的運作，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還是更重要的是，從外界取得各種有利朝鮮的資訊、書籍以及各種得益。故可看見的說明，可以更理解到當時朝鮮譯官在該時代的特殊作用。

-
- 31) 『同文彙考』是朝鮮時代對外文書的重要輯錄。關於此，詳參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韓翠花，「一部研究中、朝關係史的珍貴資料——『同文彙考中朝史料』評介」，『東北史地』，2006年第2期(2006年4月)，頁80-81。
- 32) 有關的紀錄，詳參崔韶子的著作，關於此，詳參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서울：혜안，2005)，頁35-40。
- 33) 如康熙29年(1690年)林戒先等朝鮮人越界偷蔘後，朝廷需處治那些朝鮮人外，亦特別提到將邊界官員作處治，以讓清廷放心。關於此，詳參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卷52，犯越，「禮部咨會遣官審擬咨」，頁15b-16a。
- 34) 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頁38-39；並參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卷53，犯越，「禮部知會再追查官會同前遣司官按查咨」，頁31b-32b。
- 3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0，肅宗37年3月庚子，頁12a。
- 36) 金健瑞編，『增正交隣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閣韓國學研究院，2007，卷5，「通信使行」頁217-219。
- 37) 豐臣秀吉在1598年突然病逝，前線軍官決定撤軍，但這多年來的戰役，導致日本元氣大傷，讓德川家康利用這次機會擴大自己的勢力，最終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幕府，自己成為控制日本全國大權的征夷大將軍。關於此，詳參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5期(2011年5月)，頁33-74。
- 38)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下冊，頁242-244。
- 39) 關於譯官，特別是學習日語，專門從事日語翻譯工作的「倭學譯官」在對外關係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的研究，詳參 이상규，「17세기 전반 왜학역관 康遇聖의 활동」，『한일관계사연구』24(2006年4月)，頁101-141；이상규，「17세기 초중반 왜학역관 洪喜男의 활동：통신사 파견시 수행역관 활동을 중심으로」，『한일관계사연구』26(2007年4月)，頁233-272。

Ⅲ. 金指南的生平與事功

金指南，字季明，⁴⁰⁾ 號廣川先生，⁴¹⁾ 為岑城牛峰人。⁴²⁾ 關於金指南的生平事蹟，已詳列於他本人與其兒子金慶門有份編撰的『通文館志』之中，而大致上，其經歷大致上可以分為出使日本、出使中國、翻譯文書以及擔任穆克登勘界團的朝鮮譯官代表及於濟州島擔當解決潮州漂流民事件的譯官。

與其他譯官一樣，金指南都需要通過雜科考試。在朝鮮時代，由於最高級的文科及次一等的司馬試是不容許兩班子弟以外身份的人參加。換言之，兩班以外的中人及平民，只能考再次一級的雜科考試。⁴³⁾ 雜科考試包括醫科、籌科、律科及譯科等科，及格後，會按科目安排到朝廷，擔任非決策，但實際參與行政事務的吏員，如譯官、醫官、籌員等……換言之，這些雜科考試及第的人，都只是身份不高的中人。而事實上，金指南的父親，就是曾任戶曹籌士的金汝義(1598~1657年)，⁴⁴⁾ 而牛峰金氏是朝鮮典型的中人家庭。⁴⁵⁾

由於父親僅為社會地位不高的中人，⁴⁶⁾ 故金指南亦只能參與雜科考試。他選擇了參加譯科考試。而他於康熙11年(1672年)的譯科考試中，取得了二等及格的成績，並任命為漢學教誨資憲知樞，⁴⁷⁾ 時年19歲。在擔任譯官期間，獲得了多種成就，最終被朝廷更被逐步從低位，慢慢走上司譯院正及司譯院正等重要職位。⁴⁸⁾

而從金指南的生平，可以窺探到一般譯官在對外關係活動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功能。首先，他在入職於司譯院後，便獲得朝廷的認許，安排了他於1682年，參與當年的通信使。自德川幕府建立後，每當將軍

40)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卷7，頁432。

41) 其號之名可見於和韓集中，日本人稱金指南為‘金廣川’。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7，頁432。

42) 牛峰位於朝鮮八道的黃海道，鄰近開城，亦是往返中國與朝鮮漢城的必經之路。按『東國輿地勝覽』的記載，牛峰故名為牛岑，故亦稱為岑城，高句麗時期已設郡，後於朝鮮改為縣。關於此，詳參盧思慎、李荇等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서울：東國文化社，1958)，第3冊，卷42「黃海道」，頁58-65。

43) 關於文科、司馬科及雜科的考生資格具體研究，詳參李成茂，『韓國의 科擧制度』(서울：集文社，2000)，頁187-210。

44) 金指南的墓碑已介紹金指南為金汝義之次子。關於此，詳參牛峰金氏繼全公派宗中，『牛峰金氏繼全公派世譜』(서울：족보나라，2012)，頁155。

45) 在朱子學思想影響下，朝鮮王朝為十分重視家族身份的國家。最上層者皆為士人組成的兩班階層，而兩班階層壟斷了朝廷多年來的政治權利，他們為國家的決策者。而次一等的平民或庶出的兩班後人，則只能參加雜科考試。雜科考試為各種行政及技術官僚的考試，當中包括譯學、醫學、算學等，入職於朝廷後，亦只能擔任堂下官，除非有特殊功績，否則很難改任為堂上官。關於朝鮮王朝的身份制度問題，詳參梨花女子大學校史學科研究室編，『朝鮮身分史研究——身分과 二移動』(서울：法文社，1987年)；另關於牛峰金氏的家門形成的討論，詳參白玉敬，『朝鮮 後期 牛峰金氏 가문의 門中形成과 宗稷 - 繼全公派를 中心으로 -』，『역사민속학』46(2014年11月)，頁271-310。

46) 我們可以從『朝鮮王朝實錄』中的一些上言來說明譯官等中人階層在朝鮮時代地位低微的情況。例如世宗22年，譯官李興德(生卒不詳)被批評‘出身譯語，常往來中原，多以彩帛納賂權門，雖以譯語之賤，常兼數任，時人鄙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91，世宗22年12月3日壬申，頁15B。

除此之外，李興德亦於端宗(李弘暉，144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年間曾自稱‘本係微賤，可見譯官亦知道自己的身份低微。’關於此，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端宗實錄』，卷4，端宗即位年12月29日丁巳，頁28A。

成宗13年4月時，亦有言官上言表示：‘醫、譯之流，皆出賤微，非士族也。’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卷140，成宗13年4月13日辛亥，頁13A。

47)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編號：古4650-4-v.1-2)，頁37。譯科考試一般最高等為一等合格，最低等為三等，而當屆合格者僅有19人，其中一等3人，二等5人，三等11人。

48) 金良洙，『조선 후기 中人 집안의 발전——金指南、金慶門 등 牛峰金氏事例』，頁42。

更替後，德川幕府均派對馬島的代表前往朝鮮半島，通知有關變動，⁴⁹⁾而朝鮮朝廷亦打破壬辰倭禍以後停止與日本交往的慣例，重新與日本人接觸。1681年，當第四任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年)因病去世，由他的弟弟德川綱吉(1646~1709年)繼任大將軍職位，成為第五任幕府將軍。⁵⁰⁾獲悉有關消息後，當時的朝鮮肅宗(李焞，1661~1720年，1674~1720年在位)便決定籌備使團前往日本。於是，在1682年，由戶曹參議尹趾完(1635~1718年)擔任正使、司僕寺正李彥綱(生卒不詳)擔任副使及前校理朴慶後(1644年~?)擔任從事官，合共總數四百七十三人前往江戶的通信使使團，⁵¹⁾於1682年5月出發。時任漢學前正的金指南在當次使團，負責擔任押物通事，⁵²⁾並協助使臣使團中的各種需要，主要協調各個小通事的工作及處理禮節性工作。⁵³⁾

另外，作為漢學譯官的金指南，雖然在行程中，他主要工作不在翻譯，又不通日語，但是當他接觸到語言相關疑難，他便有特別考察。當時，他在江戶附近的品川時，在附近的佛寺，遇到一位懂得漢語的僧人。於是，與他有一段的對話。

余偶以漢音私謂曰：‘人同話不同。’其倭聽之，喜而漢語曰：‘字同音不同。’余甚訝之，更問：‘你從來理會華語麼？’

對曰：‘略略學些，試問數句，粗能酬對。’

余仍攜來所館，問其學語之由。

曰：‘大君之從祖水戶候門下，多有醫師畫工方術之類，而尤留意於諸國言語，轉譯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約語之人，並皆處以別館，厚廩尊奉，而俺乃西京之人也，自幼從學於避世唐僧土木子，稍有所悟，故昨年赴其召，而土木子既死，無路進益，水戶心常慨惜，寤寐不置，今逢尊公，幸莫大焉，願乞煩教，俾之發蒙。’

余曰：‘事大交隣，有國之不可已者，環人之職，寄象之官，自古有之，則你國何獨不然，而水戶之私蓄技藝之人，抑亦何意耶？且所謂土木子，以中國何地僧，避何人難，自何年從何路來居倭京乎？今其死經幾歲，而年又幾許耶？’

曰：‘弊邦與中國，不啻如風馬牛也。剖判以來，迄不相通，而琉球暹羅安南，則相去遠近，帆有利鈍，往來無常，有似一域，而貴國之語則馬島之人，多能通曉，用是國無置員講習之規矣。然水戶宰以吾君至親，富貴無比，倚任且重，捐俸養士，為國盡誠，俺之來此，亦荷三聘之眷

49) 金健瑞編，『增正交隣志』，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7，卷5，「通信使行」，頁282-283。

50) 金健瑞編，『增正交隣志』，卷5，「通信使行」，頁282。

51) 雖然日本實行天王制，理應通信使只應前往京都。但是，在日本歷代天王都被掌握實權的大將軍架空，故通信使實際目的地是大將軍的居住地。而德川幕府當時建府於江戶，故通信使前往的地方是江戶。關於此，詳參李元植，『朝鮮通信使』(서울：民音社，1991)，頁334-336。

52) 漢學前正為司譯院為漢學譯官中最高級的官職，而由於當時通信使需一位漢學出身，擔任押物通事，即負責協調貢品及禮品安排的譯官。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國譯海行摠載』(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1)，頁40。

53)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金指南的『東槎日錄』是一個日記式的行程記載，相對於該團的首譯洪禹載(1644年~?)同一次的記載中，金指南所展示的，是將使團每一天的經過，全部鋪陳出來。而洪氏則將自己在使團中的感受呈現。因此，可以說金指南紀錄了這次通信使的安排及情況。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頁41-53；並參洪禹載，『洪譯士東槎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國譯海行摠載』(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1)，頁25-39。

耳，土木子則本非出家之類，而因明世政亂，始以強壯之年，來此為僧。寄身於西京黃蘗山萬世菴及其死也。年已八十七，而荼毗之後，已經三歲矣，其為人，與人寡合，言亦慎默，住蘗山五十年，不一日與人戲謔菴僧數百，無一人得其容接者。俺一人獨見親愛，而亦不詳其始終，相以孤介之性，不忍官吏之暴，住舟所泊，於此藏身云。信如此倭之言，則土木子，似乎賢焉者也。雖然避世藏名，自有其道，山南水北無處不可，而乃忍離親戚棄墳墓道海陸萬千里，必居於跣足涅齒之鄉，而祝髮毀冕。苟活八十者，亦獨何心哉。’

貢使之行，解倭語者隨之，信使亦有漢學通事。此乃朝廷之深思遠見也，水戶倭之培養重譯之人，其亦希用乎此耶，但不於公而於私則未知其可也。⁵⁴⁾

金指南在這次的對話中，發揮了他作為漢學譯官的功能。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之中，這些懂得漢語的僧人，往往也能夠讓使節對日本有更多的認知。在金指南這次的對話之中，不但能夠了解到水戶藩與德川幕府的關係，⁵⁵⁾ 特別是擔當對外連繫的責任，亦能夠了解到當時有一部份中國人，就像文中所提及的土木子一樣，因逃避明末戰亂，而遷至日本。使團成員與日本人的對話並不是一日就結束，由於語言上的無阻，所以‘其倭連日來候，條事質問。’⁵⁶⁾

語言是朝鮮士人與外界關係的隔閡，儘管筆談可解決問題，但是更細緻的對話，還是能夠以口語相傳更為直接及實際。因此，往往一些更深入的對談，譯官還是有其關鍵作用，以金指南與日本僧人的對話為例，可讓我們了解到明清易代後，一群流亡於日本的中國人生活情況以及日本人的對外語言培訓策略。可見，金指南作為通信使譯官，不但成為這麼龐大的使團其中一名，懂得各種安排的重要人員，而且也打開了日本與朝鮮之間的非官方文化交流，亦能呈現出朝鮮當時對外溝通的方法。⁵⁷⁾

金指南不但前往過日本，他還參與過多次中國有關的事務。1688年，廣東漂流民漂至濟州島，他亦獲朝廷委派到全羅道的海南處理漂流民遣送的工作。⁵⁸⁾ 當時有數十位的南方商民坐船先從潮州南出港購買物資，經浙江普陀澳，欲往南京蘇州等地方，但從普陀澳起航後，中途遇上海難，故漂流至濟州島，其中63名船民之中，只有15人獲得生存。在接待的同時，金指南亦不忘從這些南方船民了解當時的海洋形勢，其中金指南從他們得知鄭克塽歸順清廷後，海禁重開，並且特別紀錄了關於臺灣的事情，並將有關手本呈上。⁵⁹⁾ 由此可見，在處理各種語言上的對話，譯官仍相當重視相關的對外情報，利用機會掌握之中。

54) 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頁49。

55) 水戶藩與德川幕府有親密關係的大名之一，當大將軍無嗣時，往往需由水戶藩入嗣任大將軍，故其地位超然。因此，他們協助幕府處理各種國內外事宜是理所當然的。關於此，詳參安德魯·戈登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的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頁49。

56) 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頁49。

57) 關於金指南是次通信使參與的過程，已有不少學者對之作出了研究。有關研究，詳參白玉敬，「역관 김지남의 일본 체임과 일본 인식：“동사일록”을 중심으로」，『한국문화연구』，第10期(2006年10月)，頁169-198；Eunji Jung, “Korean Clothing and the Emperor of Japan in the 1682 Korea Embassy to Japan,” *Acta Koreana* 13.1(2010): 35-51.

58) 「備邊司啟濟州漂流漢人的發遣與支給」，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第42冊，肅宗14年9月20日。

59) 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頁；此外，關於該次漂流的研究，可參考박현규，「1688년 조선 濟州島에 표착한 潮州 출항선 기록 검토」，頁29-46。

於1692年，他亦曾擔當了當年由燕行使團的朗原君李侃(1640~1699年)及閔就道(1633~1698年)率領的冬至使行。⁶⁰⁾ 在此次燕行期間，金指南特別被閔就道委任，要求他搜索煮硝之法。據『通文館志』記載‘本國煮硝，素無善方，用功多而所得少，壬申隨閔尚書就道赴燕，尚書命公購求其方試之，所得倍蓰品，又精猛藥泉。’⁶¹⁾ 而他亦在『新傳煮硝方』中的〈得硝法始末〉亦記載到，⁶²⁾ 閔就道特別向金指南要求取得煮硝方之重要性。‘煮硝一方自祖宗朝，欲得其妙，而終不能致之，爾若求得幸莫大也。’⁶³⁾ 在閔就道的要求下，金指南以其個人的能耐，查訪中國各地，尋找有關書籍。最終金指南於東北遼東城之中，查訪一老人而獲得，並在多次往中國後取得全書內容。『得硝法始末』有記載金指南搜索煮硝之方法。

指南於是購求其方，靡不用極，而無處不腕。歸抵遼陽，潛叩村舍，得一人焉遺之，金而問之始得其術。⁶⁴⁾

在燕行的過程中，他得了這本朝鮮一直期待獲得的書籍，並在回國後，被南九萬(1629~1711年)要求下，將之翻譯為諺文，以供軍人以及製造軍火的人員閱讀。而金指南這項事功，獲得了朝廷的高度認許。

南相國啟令武庫，按方窺取，仍令公撰次成書，名曰『新傳煮硝方』，刊布中外，自是其法。⁶⁵⁾

另外，他於1711年擔任當年的冬至使使團譯官期間，特別向朝鮮朝廷匯報，有關清廷希望調查犯越事宜的情況。

回還冬至使，到瀋陽狀啓曰：譯官金指南、醫官李時弼等，聞瀋陽將軍之言，禮部郎以主事河順，爲查官，今聞以主事秩卑，郎中一員竝來，故瀋陽改以副都統托六，爲初定差官蘇馬拉之代。且聞北京差官，三月十日離發，四月四五日到瀋陽，與瀋陽官，初十日間當往鳳城。皇上分付差官，必令住在鳳城，查得殺人處，而勿爲過江，貽弊於朝鮮，犯越事查奏後，仍往白頭山，而皇旨使從大國地方作行，或不得已自朝鮮地方過去，勿令朝鮮支持云矣。⁶⁶⁾

從上述的『朝鮮王朝實錄』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獲悉朝廷派京官到瀋陽查犯越事宜，並非由一般的朝鮮使團在禮部與禮部官員見面，或在北京交遊期間獲知。相反，視事大使行為工作一部份的譯官，

60)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9，頁45b。

61)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7，頁432-433。

62) 『新傳煮硝方』現藏於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13年7月，筆者獲得該院的資助，進行檔案研究，特此向該院致謝。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662.2-G421s)。

63) 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得硝法始末」，頁19。

64) 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得硝法始末」，頁19。

65)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7，頁433。

66)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0，肅宗37年3月16日，頁12b。

經常於北京以外的地區與官員接觸，讓他們能夠知道更多中國朝廷的事情以及官方活動無法獲得信息。此外，由於他及早得知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1661~1722年在位)有意前往朝鮮邊界，⁶⁷⁾故及早有所準備，以使後來的勘界團，金指南參與接伴期間有特別充足的準備。

雖然表面上，清廷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⁶⁸⁾以調查當年所發生的朝鮮邊民越境殺人的事件，⁶⁹⁾但實際上康熙皇帝希望他‘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⁷⁰⁾曾嘗試於1711年，事前未有知會朝鮮，朝鮮領土登山勘界，但被朝鮮官員以各種藉口，成功阻止了他前往長白山天池的勘界計劃。⁷¹⁾於是，1712年，清廷正式發出通知予朝鮮。

1712年的查界，得到了正式的咨文而獲得了查界的機會。⁷²⁾接伴使由議政府右參贊朴權(1658~1715年)擔任，熟悉當地事務的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生卒不詳)一同陪同。此外，熟悉清與朝鮮之間情況的譯官金指南被任命為穆克登(1664~1735年)查界團的隨團譯官。⁷³⁾其中，任命他的主要原因，可從『朝鮮王朝實錄』的一段記載窺探。

備邊司啓言：譯官金指南，當初親聞瀋陽將軍之言，以為：“皇上分付差官，必令住在鳳城，勿為過江，貽弊朝鮮。”今遣金指南，以口語詰責，似可得力。⁷⁴⁾

由此可見，對於朝廷而言，能操流利漢語，與清廷官員對話，最為優勢。然而，金指南由於年老關係，與朴權及李善溥一樣，未有實際陪同穆克登到白頭山的天池，改由金指南兒子金慶門及年輕的譯官金應瀣陪同前往。⁷⁵⁾不過，金指南卻為整次查界的種種，著下了重要的『北征錄』，記載了整件事的發生經過，⁷⁶⁾

67) 康熙皇帝查界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中朝邊界不清，以致私相越界從事各種伐木、採參等經濟活動。但更重要的是，1707年起，康熙著手派人編纂『皇輿全覽圖』期間，並在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年)，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等人協助下，在傳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年)、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0年)，費隱(Ehrenbert Xavier Fridell, 1673~1743年)等人實際進行探查地形，完成了『盛京全圖』、『烏蘇里江圖』、『黑龍江口圖』、『熱河圖』等。然而，朝廷卻發現長白山地區，特別是鴨綠江、圖們江之間不甚詳細。為了解決有關地理勘查的問題，朝廷決定派人前往當地進行勘界。關於此，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8-93；並參秦國經，『18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97年2月)，頁38-39。

68) 穆克登，是滿洲鑲黃旗官員，曾在京城擔任皇帝侍衛，及後調遷到吉林擔任總管，並奉康熙帝之命處理朝鮮人越境以及中朝之間邊界問題。關於他的生平，詳參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283，列傳70，「覺羅武默訥」，頁10177。

69)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67-75。

70) 『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5，康熙50年5月癸巳，6b-7b。

71) 當時派往接待的宋正明，引領穆克登走入地勢絕險的道路，促使穆克登認為無法前往長白山天池進行勘查，只好回國覆命，再從長計議。詳參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96-100。

72) 『平安監司彙集一』，以勅使牌文出來事啓聞。其文曰：“欽差正使頭等侍衛阿齊圖護獵總管穆克登，奉命前往朝鮮國，五月初二日起行。詔書一道，御杖一對，欽差牌貳面，回避肅靜牌四面，黃傘貳柄，五官司曆。六品通官三員，跟役十九名。”關於此，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40冊，『肅宗實錄』，卷53，肅宗39年5月壬辰，頁499。

7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6月壬戌，頁32b。

7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4月丙戌，頁22a

75) 『萬機要覽』是19世紀初著名學者沈象圭(1766~1838年)及徐榮輔(1759~1816)所編的著作，是一本朝鮮晚期重要的百科全書，在「軍政篇5」的白頭山定界提到：「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道巡察使李善溥(1646~1721年)，譯官金慶門等，接應

可見作為譯官對於涉及朝鮮與對外關係時，即使未能親身參與，仍需處理若干重要的工作。⁷⁷⁾ 由此可見，譯官在對外使團以及接待外使兩種對外處理的事務中都需要協助其中。

此外，雖然是次接伴使為朴權，但似乎朴權對於如何爭論卻無從入手，可以從『朝鮮王朝實錄』的資料提及到他只是臨危受命，⁷⁸⁾ 儘管委以重任，但亦不知如何以有力的證據與清廷一方爭論邊界。他曾嘗試提出以『盛京通志』作證明，白頭山以南為朝鮮境之說。但是，及後卻被朝廷其他官員質疑，此為禁書，不可讓清廷得悉有關事情，故只好再從長計議。⁷⁹⁾

那麼，朝鮮一方由誰與穆克登爭論？『朝鮮王朝實錄』曾提到朴權在接伴穆克登期間，‘使譯官越去候問’。⁸⁰⁾ 但到底是甚麼譯官負責與穆克登呢？然而，再考察金指南所撰寫的『北征錄』，便會發現，與穆克登討論兩國界線的人，提出朝方主張，正是熟悉中國事務的金指南及其兒子金慶門。

在行程期間，金指南努力向穆克登表示朝鮮王朝就江源及邊界的主張。在金指南的『北征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金指南如何代表王朝去爭取朝鮮的主張。當時，金指南表示：‘總官招余謂：“我們此行，專為看審邊界而已。雖上天入地，當依你們所指示而往。你今明說你國邊界，果何如耶？”余答曰：“長白山巔大池之南，是吾邊界之意，當初有訴，今何改說。”總官曰：“然則勢將登山以去。”’⁸¹⁾

當穆克登決定登山勘界時，金指南卻因年老關係，穆克登不讓他陪同，以使他未有親身前往天池。但是穆克登在天池的觀察及最終的決定，正正就是當初金指南通知他的說法，他沒有過份質疑。結果，穆克登到達天池後，認同長白山天池正是鴨綠江與圖們江之間的分界，並決定於當地立碑。⁸²⁾ 可見，這種說法，

克登。克登以權與善溥年老不許偕行，率慶門等，上白頭山……關於此，詳參沈象圭、徐榮輔編，『萬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8年)，頁621；並參李花子，『清代長白山踏查活動及對三江源的記述』，『韓國研究論叢』23(2011年)，頁421-422。

76) 金指南引錄了當時陪同穆克登的金慶門、金應憲(김응헌, 1663年~?)等馳報及手本而組成的資料，故金指南雖然未有親自前往天池，但是仍然對於整件事件起了重要的作用。關於此，詳參李花子，『康熙年間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會科學輯刊』197(2011年12月)，頁189。

77) 關於金指南在穆克登登山的過程之中的貢獻與作用的討論，詳參이상태，『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歷史와實學』33(2007年9月)，頁75-119。

78) 朝廷原定任命接伴使權尚游，但‘接伴使權尚游，巡撫湖南時，重傷水土，疾病不輕。似當許遞，而宰臣中朴權，明敏善應變，請代送。’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3月戊戌，頁16a。

79) ‘接伴使朴權辭陞啓言：“清國『盛京誌』，明有白頭山南，是朝鮮境之說，請齋往行中，如有爭端，以此書為證。”上從之。其後議者多言，“『盛京誌』是禁物，彼若詰問其從何得來，則生事可慮。”上又從其言，命勿為出示。’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3月丁未，頁17b。

8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5月丁亥，頁22a。

81) 金指南，『北征錄』(京城：朝鮮史編修會，1945年)，頁101。另外，金慶門亦以相同的論調，嘗試與穆克登交涉。『朝鮮王朝實錄』與金慶門口述，洪世泰撰之『白頭山記』均有記載有關啟狀。

總管曰：‘爾能明知兩國界耶？’

答以：‘雖未目見，而長白山巔有大池，西流為鴨綠江，東流為豆滿江，大池之南即我國界。上年皇帝招同時，亦以此仰對矣。’

又問：‘有可據文書耶？’

答以：‘立國以來，至今流傳，何待文書耶？’

又問：‘白山之南，連有把守耶？’

答以：‘此地絕險，人跡不至，故荒廢無把守，有同大國柵門外之地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5月丁亥，頁22a；洪世泰，『柳下集』，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第167冊，『白頭山記』，卷9，頁15b-16a。

是與金指南及其兒子金慶門的想法有相當的關係，亦確認了長白山以南的皆為朝鮮領土。⁸³⁾

此外，朴權與金指南等官員因年老不能上山，故特別向穆克登要求登山後的「山圖」，以便向朝廷交代，免除責任，這是作為接伴使領導朴權也沒有想得這麼仔細的一件事。⁸⁴⁾ 還有的是，考察期間，穆克登發現大批朝鮮平民，紛紛到中國所屬地方，大規模伐木，而穆克登本有意向朝廷匯報。但金指南的解釋讓他改絕主意。

前日臣權，到茂山時，首譯金指南來言：「侍衛以佃獵事，越往彼邊，還後密言曰：“大國境樹木，無數斫伐，車載船運之跡，極其狼藉。爾國吏民，可謂不畏法禁矣。”指南答以江邊無識之民，有此可駭之事誠極寒心，而此事一發，當死者甚多，以老爺惻隱之心，何忍為此耶？侍衛曰：“吾當含默，但隨行人之口，恐難盡掩也。”⁸⁵⁾

上述的例子可見，無論作為使團的成員，還是接伴使的助手，金指南都是一個盡責的譯官。不但在語言上的翻譯，協助朝鮮解決了若干疑難，還按其長處，協助朝鮮取得了，當時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成就。而事實上，他更被推恩加階至「知中樞府事」。⁸⁶⁾

後來，金指南更被相國崔錫鼎(1645~1715年)委以重任，負責展開編製『通文館志』的工作。⁸⁷⁾ 由於司譯院與承文院等禮曹機構收集了大批與燕行相關的資料，但未有作出任何整理。對於處理對外關係，似乎需要一本書籍，以供後來的譯官及外交人員作參考。於是，朝廷委以金指南參與編撰工作，然而，全書未能完成，他先後離世，並最終由其子金慶門完成。⁸⁸⁾ 但是，當中不少部份皆由金指南所撰寫，且他對於燕行及對中事務有親身參與的經歷，讓『通文館志』對於後世的譯官及相關人員使用，帶來了莫大的方便，亦為學界研究明清兩代與朝鮮關係的建立及特殊性，有很大的幫助。

觀其一生，雖然他不幸於撰寫『通文館志』期間去世，未能完成有關任務，但可從中發現他對於朝鮮康熙年間與中國事務的運作，有相當大的貢獻，從他的數十年生平事蹟，可以窺探出譯官並非單純的技術官僚，朝鮮對外的關係聯繫的建構中，特別是政治及文化等領域，他們的角色都不分忽略。與此同時，他們擔當的媒介角色，正正是朝鮮社會對譯官的一種期盼而得出的結果。

IV. 翻譯規範與東亞文化交流史視野下的金指南

上文討論過他任職譯官期間的各類事功以及對朝鮮的貢獻，現將其所作出的貢獻並置於翻譯規範的概念

82) 後世對於立碑的正確位置有很大的爭論，有學者認為朝鮮人故意讓穆克登到小白山頂，後來才移至長白山。因為長白山是鴨綠江與松花江的分水嶺。然而，這種說法並沒有足夠的史料支撐，而本文亦只集中討論譯官的意義，故不詳述爭論。關於此，詳參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183-184。

83) 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45。

84) 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40-41。

8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51，肅宗38年6月壬戌，頁32b。

86)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7，頁435。

87)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上冊，卷7，頁435。

88)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上冊，序，頁1-3。

之中去了解與分析，並解構在東亞文化交流史的視野下，朝鮮譯官的活動與舉動是如何同時背負著朝鮮社會對譯官工作的期盼，以及同時展示出他們作為文化之間對話互動過程之中，不可忽略的媒介。

首先，於1692年，閔就道要求金指南參與燕行期間，尋找有關煮硝的書籍，以供朝廷使用。硝是當時重要的火藥原材，對於朝鮮軍事發展有很有幫助的，但是朝鮮國內的煮硝法品質不高，亦花費不少，故對火藥發展帶來障礙。⁸⁹⁾ 然而，金指南因其語言的優勢，能夠深入鄉郊，於遼東城附近，找得一位中國老人有相關書籍。這個事例，可反映譯官協助朝鮮士人擴闊了以往的獲取中國書籍的渠道，不再單純於北京琉璃廠，而是更實際地深入民間。而且，使行正、副使往往一生只有一兩次機會參與出使活動，但譯官能多次出入中國。由於得知有老人還收藏此書後，由於一次的，未能盡得其書內容，故金指南在閔就道的要求下，多次往返中國，最終取得了有關書籍。

閔公歸奏筵席，別遣指南於癸酉歲使之行，使盡其詳而後，中令嚴法重，故人亦畏，而杪之前後訪問之際，幾死者數矣。朕而盡心得問，反覈質正，一再往來，盡傳而法，歸而試於私，隨手即成真妙方也。⁹⁰⁾

而他們又由於能操流行的漢文與諺文，自然可以讓書籍流通於兩班士人階層以外的人，皆能夠閱讀各種從中國搜獲的漢文書籍。而事實上『新傳煮硝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金指南取得該書後，並獲得朝廷高度認許。而當時的相國南九萬為了使內容更為流通，便向朝廷要求讓金指南將『新傳煮硝方』進行翻譯，他認為透過翻譯成諺文，將可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該書，亦可令此書流傳更長久。

金指南所學煮硝之法，若以文字作為方文，傳示中外，則可以廣其學習，亦可傳諸之久。令指南作為文字備述其法令，軍器寺刊布中外何如？⁹¹⁾

而事實上，雖然朝鮮王朝大部份文獻皆以漢字撰寫，但是朝鮮人使用的語言是韓語，而低下階層能容易理解的文字亦只有諺文。⁹²⁾ 故漢字文化圈之中，並不能單純以漢字或筆談能夠全面地表達出文化交流的過程，相反，中國知識傳遞至朝鮮社會或其他漢字文化圈地區，譯官擔當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縱使譯官擔當著這樣的重要媒介工作，將知識進行傳播與普及化，但問題來自的是當時的社會期盼，是朝廷渴望從中國取得相關知識，而需要依賴譯官作出相關的行動作出對應，故譯官之媒介行為的構成往往關乎到當時的社會需求，而有所改竄。

此外，在關係到朝鮮與清廷的政治問題之中，譯官的角色也非常重要。『通文館志』的記載，充份反映了朝鮮王朝在穆克登登山的過程中，十分依賴金指南完成有關使行，亦可從中看見當中朝鮮朝廷微妙之關

89) 詳參朱晶，「古朝鮮引入與改進火藥和火器的歷史研究」，『東疆學刊』，第25卷第1期(2008年1月)，頁37。

90) 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碍硝法始末」，頁20。

91) 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碍硝法始末」，頁23。

92) 林東錫，『朝鮮譯學考』，頁77-78。

係，是重要的功臣。

壬辰，帝令烏喇總管穆克登行審鴨綠江，以上至土門江入海處查明邊界。先是我東雖知兩江為界，而白頭中原人則謂此山為長白以南，長白以北幅員幾千餘里，自古荒廢。輿志所載語多謬誤，故朝野駭惑多過慮。至於交章論說，接伴使朴尚書權啟帶公(注：金指南)往與論辨。公謂穆曰，夫兩江作界，自古已定，而兩江之源出自白頭山頂潭水，潭之北為上國之界，其南即吾地。反覆曉告，穆果大悟，遂導至山巔立碑，潭畔以為界，又畫山形疆域作為二本一進 皇帝，一置本國，以為左契。⁹³⁾

雖然『通文館志』為司譯院內部文件撰寫而成的資料，自然對金指南有所追捧。⁹⁴⁾ 但是，從上文所提及過的勘界經歷，亦不能否認的是，金指南擔當了關鍵的角色。而事實上，金指南在與中國交涉期間，他不但只是僅僅的接伴團員，而是按照朝鮮的期盼，與中國代表穆克登爭論有關邊界，而完成任務的關鍵人物。而事實上，譯官因各種公務能多次往返中國，⁹⁵⁾ 且在其教科書上，對於中國方面的知識，以及邊界的實際情況有豐富的知識。⁹⁶⁾ 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金指南自然能夠代表朝鮮，與中國爭論邊界的具體安排。而由於中國官員礙於東北地區知識的困乏，無徵可信，亦只能信任朝鮮譯官的主張，形成了當日的邊界結果。

而且，高級士人礙於語言限制以及思想上的排斥，在接伴的過程中，根本沒有機會安坐於桌前，以筆談與中國官員對話，爭取朝鮮朝廷期望的權益。在這樣文化空間下，譯官的角色更為重要，而金指南以及其兒子金慶門在穆克登勘界的每一刻皆陪伴著，並與穆克登作出不同的對話，亦為朝鮮的立場努力爭辯，最終取得了朝鮮朝廷預期看見的成績。由此可見，這都顯示出譯官在關係到疆界的議題之中，發揮了顯著的功用。

從金指南上述的經歷，讓我們可以了解到譯官從多個面向建構及影響著朝鮮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對外關係。從語言上來說，金指南等譯官為朝鮮與清廷或是日本之間的各種對外事務帶來種種的方便。由於他們語言上的支援以及文書上的翻譯，以金指南為例，他將中國的書籍翻譯，又在語言上為朝鮮的立場據理力爭，可見當中之間他們作出的作用，為朝鮮帶來期望的結果。此外，譯官會按朝鮮朝廷希望了解中國各方面情況的因素之下，經常從不同地方收集對外的知識情報，例如金氏在通信使團或是濟州的任務期間，也不忘將中國社會的情報收集，並呈上手本，讓朝廷了解。從這些角度的觀察下，也可看見到譯官的行為因朝廷的需求，不再單純擔當語言上溝通或翻譯的工作，也涉及到文化傳播、情報收集以及爭取朝鮮權益更多層次的作用。其中一個金指南的一次的使行工作，足可印證朝鮮譯官的工作如何為朝鮮在一些對外事務的交道之中取得有利的條件。金指南曾被政府委派於1710年，到當年的燕行使入京途中，與盛京將軍松柱(中國資料稱之為嵩祝，1657~1735年)見面，並就歲貢問題，與他積極與之對談。⁹⁷⁾ 據通文館志記載：

93)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上冊，卷7，頁433-434。

94) 而事實上，主要作者就是其兒子金慶門。

95) 以金指南為例，他曾於1692至1711年期間，有多種紀錄提及他曾往返北京、東北地區及朝鮮半島，又曾於濟洲島處理漂流漢人的事，故能夠有特別多機會接觸漢人和理解中國事務，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戊辰九月初四日濟州漂漢人處問情手本」，頁53。

96) 專責訓練譯官的司譯院，不只是單語的外語訓練機構，而且是一個專責協調各種對外的‘事大’或‘交鄰’事務。而他們所編的『同文考略』、『通文館志』均反映他們有足夠的資料，去理解有關各種中國事務，特別是邊界事宜。

庚寅，隨東平尉鄭輪崙赴燕，偶與藩帥松柱語數日，盛陳我國家恪謹侯度柱後入面奏 皇帝，自是帝多蠲省於本國。⁹⁸⁾

而事實上，據中國方面的紀錄，嵩祝於康熙50年(1711年)完成盛京將軍職務後，便回京擔任禮部尚書。⁹⁹⁾而按大清會典事例，「五十一年(1712年)諭，朝鮮國慎守封圻，恪循儀度。四十餘年來，未嘗稍懈。朕用嘉美，將該國貢典，屢加裁減。」¹⁰⁰⁾故金指南的意見得以改變了朝鮮的朝貢安排，也符合了朝鮮的期盼，可見朝鮮譯官在媒介的角色發揮的時候，是考慮著朝鮮社會的需求，而作出了各種貢獻，這一較少學者曾關注的例子，似乎足以證明相關的論述。

從朝鮮對外活動的脈絡下，可以理解到朝鮮譯官的工作，有別具意義的存在價值，特別是金指南等漢語譯官能精通漢語，使臣都自然不刻意去收集資訊或去認識中國，轉移依賴譯官與中國官員周旋、對話或辯論，並取得朝鮮期待取得的信息。而金指南的經歷，協助我們了解關係的建立及其具體操作，並非由兩班階層的朝鮮士人參與，而只是當中的報告者及負責者而已。從朴權的啟狀可看見，雖然朴權為穆克登勘界團接伴使，但是他向朝廷匯報朝方的主張及部署都是引述金指南或其兒子的工作。換句話說，與中國官員溝通，代表朝鮮爭取朝鮮情況，甚至書籍的搜購，都是譯官處理及參與。故士人固然提供了不少理據，讓我們理解到朝鮮人對清廷的觀感以及策略的變化，但是關係的維持及建構，似乎不可忽略譯官的語言及外交手段。而這種手段亦可轉移為了解在朝鮮社會在17~18世紀的華夷觀轉變的社會之下，如何採用了不同的譯官作為重要的媒介，處理對外的事務。過去只從文獻看的或許讓我們忽略當中交流過程的具體建構。

V. 結 論

朝鮮譯官的研究，在過去當然已獲得不少學者很多的關注以及肯定他們的學術價值，但似乎發展的空間仍然有不少，其中值得理解的是譯官如何擔當這些媒介角色，與此同時這些媒介角色是受著甚麼的因素而作出相對的行為，均是過去學術研究未有特別留意的問題。但隨著翻譯研究中的規範觀念使大家對於翻譯行為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期盼有所重視，並且東亞文化交流史的新視野提出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方法的發展幫助下，讓研究文化交流史的視野，更為關注在具體的運作與過程之中，亦因此使譯官的媒介形象，能以各種交流過程的例子之中得以形象化的說明，並且了解到有關的媒介的形成，與朝鮮社會與國家政策是不

97) 金良洙, 『조선후기中人집안의 발전: 金指南, 金慶門 등 牛峰金氏事例』, 頁42.

98)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 『通文館志』, 上冊, 卷7, 頁433.

99) 清史稿載:「四十八年, 署奉天將軍。海盜舟泊雙島, 挾火器出掠, 遣兵擊殺三十餘人, 得其舟一。疏請山東水師兼巡奉天屬金州鐵山, 又請選盛京滿洲兵千人習鳥槍, 設火器營, 皆從之。遷禮部尚書。」, 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北京: 中華書局, 1976年), 卷267, 「列傳54·嵩祝」, 頁9973.

100)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編,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第6冊, 卷503, 禮部214 「朝貢2·貢物1·康熙51年」, 頁822.

可分開的。

此外，臺灣學者黃俊傑留意到不少現時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大多關注的是文化交流後的成果，以朝鮮為例，北學、西學在朝鮮半島的發展正是這樣的研究趨向，但他卻提出這樣的文化交流研究應轉向為重視交流的過程及當中的細節，當中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物品的交易等，都是值得商討，並引發更多的討論的角度。而事實上，透過了解譯官金指南的活動，卻可了解到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之中，擔當媒介的譯官們如何掌握資訊，並扭轉結果，甚至是促進了彼此文化之間人物交往更為緊密，這些都是對於細節的掌握，有助認識文化交流脈絡發展與變化的關鍵。而金指南無論在擔任任何外交以及翻譯的任務時，他的行動及相關細節，往往對事情起予關鍵的作用，這亦是如若研究只探討著文化交流結果，而忽略文化交流過程會所忽略的研究，而本文藉著黃俊傑的想法，確認了譯官在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作用，並探討這些對於東亞文化互動所帶來的影響。

本論文透過了解研究個案中，朝鮮譯官金指南的各種對外活動的經歷以及其身處的時代背景，了解朝鮮譯官在擔任各種重要的職務，特別是協助朝臣時，如何以漢語與中國官員周旋，以達成各種目標，又翻譯朝鮮社會需求的書籍，並實際參與各種影響朝鮮日後國家發展的關鍵事件，這些的翻譯行為正正符合當時朝鮮社會的需求與期盼。故此，透過東亞文化交流史與翻譯研究的新視野切入重新了解朝鮮譯官，不但使大家重新關注東亞文化之間，除了文化交流的結果之外，譯官的媒介角色是在朝鮮社會對於朝鮮社會因應當時環境而所期盼的結果，而且，也使學界可以透過新史料發掘與新視野的切入，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仍存在的空白填補。

〈參考文獻〉

一、原始史料

- 『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 沈象圭、徐榮輔編，『萬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8。
- 林東錫，『朝鮮譯學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
- 金指南，『北征錄』，京城：朝鮮史編修會，1945。
- 金指南，『金譯士東槎日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國譯海行摠載』，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1。
- 金指南，『諺解新傳煮硝方』，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662.2-G421s。
-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
- 金健瑞編，『增正交隣志』，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7。
- 洪世泰，『柳下集』，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
- 洪禹載，『洪譯士東槎錄』，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國譯海行摠載』，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 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 1986,『太祖實錄』、『太宗實錄』、『世宗實錄』、『端宗實錄』、『成宗實錄』、『肅宗實錄』。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1976~1977。

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臺北:珪庭出版社, 1978。

鄭麟趾,『高麗史』, 서울:亞細亞文化社, 1972。

盧思慎、李荇等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서울:東國文化社, 1958。

二、近人論著－專著

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1997.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oury, Gideon. *The Nature and Norm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牛峰金氏繼全公派宗中,『牛峰金氏繼全公派世譜』, 서울:족보나라, 2012。

白玉敬,『朝鮮前期譯官研究』, 서울:韓國研究院, 2000。

安德魯·戈登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的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6。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 서울:民音社, 1991。

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 1972。

李成茂,『韓國의 科擧制度』, 서울:集文社, 2000。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06。

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 서울:國學資料院, 2000。

金良洙,『조선후기 中人집안의 발전——金指南、金慶門등牛峰金氏事例』, 서울:백산자료원, 2008。

姜信沆,『李朝時代의 譯學政策과 譯學者』, 서울:塔出版社, 1978。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崔官,『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清與朝鮮——近世東亞的相互認識), 서울:혜안, 2005。

梨花女子大學校史學科研究室編,『朝鮮身分史研究——身分과 二移動』, 서울:法文社, 1987。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1。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鄭光,『朝鮮朝譯科試卷研究』, 서울: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 1975。

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에 관한 韓中日 三國의 國際위크숍』。

三、近人論著－單篇論文

Jung, Eunji, "Korean Clothing and the Emperor of Japan in the 1682 Korea Embassy to Japan," *Acta Koreana* 13,1(2010): 35-51.

王振忠,「朝鮮柳得恭筆下清乾嘉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抄本〈冷齋詩集〉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90(2008年6月)。

朱晶,「古朝鮮引入與改進火藥和火器的歷史研究」,『東疆學刊』,第25卷第1期(2008年1月)。

李花子,「康熙年間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會科學輯刊』197(2011年12月)。

谷小溪,「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6期(2013年11月)。

金良洙,「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的 政治外交: 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역사와 실학』12(1991年1月)。

禹景燮,「宋時烈的 華夷論과 朝鮮中華主義의 성립」,『震檀學報』101(2006年6月)。

禹景燮,「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한국사연구』159(2012年12月)。

范金民、羅曉翔,「朝鮮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國風情——以崔斗燦『乘槎錄』為中心」,『史學集刊』,2009年第3期(2009年5月)。

徐仁範,「조선전기 연행록 사료의 가치와 그 활용」,『명청사연구』30(2008年10月)。

烏雲高娃,「朝鮮司譯院蒙古語教習活動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及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總137期(2001年7月)。

崔韶子,「明清時代對外關係史의 成果과課題」,『明清史研究』19(2003年月份缺)。

崔韶子,「“燕行錄” 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청사연구』30(2008年10月)。

張敏,「韓國譯學源流考」,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22,上海: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2009。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2009年6月)。

楊雨蕾,「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4期(2004年9月)。

楊聯陞,「中國文化的媒介人物——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〇次座談會紀要」,『大陸雜誌』,第15卷第4期(1957年8月)。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總81期)(2006年6月)。

裴英姬,「『燕行錄』의 研究史回顧(1933~2008年)」,『臺大歷史學報』43(2009年6月)。

劉家駒,「康熙皇帝的集權與激變」,『東吳歷史學報』2(1996年3月)。

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 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동아인문학』12(2007年12月)。

- 鄭恩主, 「燕行使節의 西洋畫 인식과 寫眞術 유입 : 北京 天主堂을 중심으로」, 『명청사연구』 30(2008년 10월).
- 韓翠花, 「一部研究中、朝關係史의 珍貴資料——『同文彙考中朝史料』評介」, 『東北史地』, 2006년 第2期 (2006년 4월).
- 박현규, 「1688년 조선 濟州島에 표착한 潮州 출항선 기록 검토」, 『동북아문화연구』 14(2008년 3월).
- 백옥경, 「역관 김지남의 일본 체험과 일본 인식 : “동사일록”을 중심으로」, 『한국문화연구』 10(2006년 10월).
- 羅樂然, 「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 『中國史研究』 82(2012년 12월).
- 羅樂然, 「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樞譯官——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 『漢學研究』, 第33卷第3期(2015년 9월).
- 원재연, 「17~19세기 연행사의 북경 내 활동공간 연구」, 『동북아역사논총』 26(2009년 12월).
- 이상규, 「17세기 전반 왜학역관 康遇聖의 활동」, 『한일관계사연구』 24(2006년 4월).
- 이상규, 「17세기 초중반 왜학역관 洪喜男의 활동 : 통신사 파견시 수행역관 활동을 중심으로」, 『한일관계사연구』 26(2007년 4월).
- 이상규, 「조선후기 川寧玄氏家の 譯官活動」, 『한일관계사연구』 20(2004년 4월).
- 이상태, 「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 『역사와 실학』 33(2007년 9월).
- 장경남, 「조선후기 연행록의 天主堂 견문기와 西學 인식」, 『우리文學研究』 26(2009년 2월).
- 장안영, 「18세기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역관 통역의 문제점 고찰 : “노가재연행일기” · “을병연행록” · “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 『어문론집』 62(2015년 6월).
- 진재교, 「18세기 동아시아와 知識·情報의 메신저, 譯官」, 『韓國漢文學研究』 47(2011년 月份缺).

四、近人論著－學位論文

金良洙, 『朝鮮後期の 譯官身分에 관한研究』, 서울 : 延世大學校歷史學科博士論文, 1986.

- * 이 논문은 2015년 11월 4일에 투고되어,
2015년 12월 11일까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심사위원을 선정하고,
2015년 12월 30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16년 1월 7일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가 결정되었음.

국문초록

동아시아문화교류관점에서 조선역관의 역할

- 역관김지남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 -

나락연*

요즘 수많은 “연행록”과 관련된 자료들이 정리와 출판하고 나서 동아시아 각 국에서 명청시대와 조선시대의 교류사에 대한 연구는 많이 이루어지고 있다. 이 자료를 통해서 새로운 시각으로 중국과 조선에 대한 교류사 연구를 진행하고 있다. 특히 역관에 대한 연구도 점차 주목을 받았음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예를 들면, 청나라 康熙 때 활동하였던 조선 역관인 金指南은 청인 穆克登이 주도한 勘界團에서 역관으로서 많이 활동하였다. 또한 김지남이 외교 사절로 외국에 가는 동안 한반도에서 찾기 어려운 서적들을 한반도에 도입하였다. 뿐만 아니라 조선 지식인이 관원에게 더욱 수월하게 읽을 수 있도록 번역도 많이 하였다. 이외에 그는 司譯院 院正에 재직하였을 때 “通文館志”도 편찬하였다. 이로 인해 김지남이 여러 방면에서 중국과 조선 외교 교류할 때 큰 역할임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리하여 본고는 한국과 중국에서 출판된 “通文館志”·“譯官上言騰錄”·“北征錄”·“東槎日錄”과 아직 출판되지 못한 “新傳煮砂方”을 통해서 김지남 등 역관이 조선시대에 있어서 대외관계에서 어떤 역할을 맡긴지 그들의 영향을 어디까지 주었는지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본고를 통해서 김지남 등 역관들이 그 당시에 끼친 영향은 언어의 통·번역뿐만 아니라 동아시아의 문화교류에서도 매우 큰 역할을 맡았음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주제어] 김지남, 조선역관, 연행사, 조선-청나라 관계

* 홍콩대학 요종이학술관 / 싱가포르 남양이공대학교 중문학과

Abstract

The Role of Chosŏn Interpreter by the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Study of Kim Chi-nam's Activities

Lok-yin Law*

Recently,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ing and Chosŏn was flourishing in the field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becau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Yŏnhaengrok* providing a lot of valuable historical sources. Scholars in East Asia can utilize the sources by the new perspectives to farther more information to solve the pervious limitation in the academia. Besides the leaders of *Yŏnhaengsa*, the contribution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of the mission members, such as *Yŏkkwan* (Official Interpreter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on the case of Kim Chi-nam(1654~1718) to identify how his works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accompanying interpreter for the Mukedeng(1664~1735) mission of demarcation in the border between Chosŏn and Qing. In this duty, he was assigned to deal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border with the Chinese officers. He was also demanded by the leaders of *Yŏnhaengsa* to collect some precious books during his duty in China. He also translated those books in Hangul to help the local officers to read it. Since he was promoted to be the head of ministry of interpretation because of his good records of the duty, he start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interpreters for editing *T'ongmunkwanchi* to help all of us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ing and Chosŏn. It can be found that, Kim Chi-nam was the good case to understand how Interpreters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Qing perio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investigate the documents which has already published or unpublished Chinese and Korean documents, such as *T'ongmunkwanchi*, *Yŏkkwansangŏn dŭngrok*, *Pukchŏngrok*, *Sinchŏnchasapang*……etc. to grasp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role of Kim Chi-nam and other Chosŏn interpreters in the Kangxi period by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to re-understand the agent role of Chosŏn interpreters.

[Key Words] Kim Chi-nam, Chosŏn interpreters, *Yŏnhaengsa*, Qing and Chosŏn Relations

* Ph.D, Program, 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Researcher,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